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2-0029-05

关于红船精神认识误区的几点辨析

游海华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红船精神”自提出以后,得到了学界的深度阐释和研究,其中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主要有:红船起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具有历史必然性,非浙江莫属;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全部“源头活水”。事实是: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但对红船精神的阐释应超越浙江、超越地域性因素;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而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更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全部“源头活水”。只有正确认识红船精神,科学阐释红船精神,才能彰显理论的深度和其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

关键词:红船精神;认识误区;科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2.006

2005年6月21日,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理论文章,明确提出了“红船精神”,并将其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自红船精神提出10年来,已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界发表了系列论著对红船精神进行了深度阐释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宣传效果。细细学习这些丰硕成果,笔者受教良多,获益匪浅,但同时认为,其中一些阐释还存在认识误区;只有正确认识红船精神,科学阐释红船精神,才能彰显理论的深度和其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

一、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但对红船精神的阐释应超越浙江

不少论者认为,无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理论准备还是组织准备来说,红船起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1][2]}论者着

重强调,在党的创建和红船精神的产生中,浙江扮演了历史必然性的角色。其言下之意是,党的创建和红船精神的产生地,非浙江莫属。为方便讨论,暂且将这种观点称为“必然浙江论”。

“必然浙江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如上海早期党组织15人中^①,浙江籍就有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沈定一等7人。二是浙江先进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俞秀松、施存统1919年创办的《浙江新潮》是全国较早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在国内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三大评论之一,以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获得盛名;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早期工人运动。如俞秀松最早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担任过上海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15-11-27

作者简介:游海华(1972-),男,江西丰城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据记载,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17人。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17人中,浙籍7人,最多;湘籍第二,6人;其他皖、鄂、鲁、粤籍各1人。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研究会的劳工部长;宣中华等在杭州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四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参与创建了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如1920年,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2年,施存统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团中央书记。

这些史实证明,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在党创建前后的理论阐释、舆论宣传和组织筹备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细细检审上述四点理由,不难发现: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和上述四点论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和在上海加入中共的7名浙籍党员没有任何关系,且他们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中共一大结束会议在南湖召开,和上海会议地点密探的突然闯入,以及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有关,和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梧有关,和王对家乡嘉兴事务熟悉并对党的事业热心有关,和上海到嘉兴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南湖适宜的会议环境有关。正是这些系列因素,尤其是偶然性因素,成就了中共一大的南湖之行。

进一步分析,更不难发现:浙籍先进知识分子为党的创建作出较大贡献的舞台都在上海,而不在浙江,上海才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史实表明:在党的一大召开前,7名浙籍先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而当时的浙江(杭州)还没有党组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是在上海出版发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大都是上海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并在上海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必然浙江论”的观点本意是强调党诞生在浙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主要论据却是浙籍人在上海的作为和贡献,其论据不仅不足以支撑其观点,反而证明了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

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上海这个大舞台,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贡献将大为缩小,或将消失于无形。浙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空白史,就

是很好的明证。党的一大召开前,国内外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6个城市,以及东京、巴黎等地;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了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湘区执行委员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北京地方委员会、武汉(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下辖12个支部和两个党小组。^[3](P57-63,P101)很明显,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建进程中,浙江相对滞后,至少在党的二大召开前还没有开幕。这说明,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浙江地域的先进性因素无从体现,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又从何谈起?

此外,还可作进一步的推论。如果说“红船启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依照常理推断,中共建立和红船精神诞生后,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中共浙江地方组织应该得到较快和较程度的发展,浙江党的事业应该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据笔者的研究,若以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建立时间的先后来衡量,浙江省建党时间不但落后于一大前就建立了中共早期组织的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山东六省,而且落后于二大前已建党的江西、河北、河南、江苏、四川等省,在周边各省中,仅领先于安徽省和福建省;若以党员数量论,大革命期间,上海、湖南、湖北、广东是浙江的数倍,浙江与江苏、江西、山东等省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或层次。^[4]这说明,自中共建党以来,到大革命失败前这段时间,浙江地域的先进性作用无从发挥,历史必然性在浙江无从体现。

如果一定要强调历史必然性的话,相比较而言,那也应该是非上海莫属,或上海具有更多的历史必然性。有论者就指出,正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5]有趣的是,历史偶然性又和这种“必然上海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众所周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上海召开,会期也主要是在上海进行,但最后一天会议却在浙江(嘉兴)^[4]。^①

历史推展的进程就是这样,似乎充满着悖论。

^①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比作婴儿出生,十月怀胎在上海,但最终呱呱坠地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笔者称之为“花开上海,果结浙江”。这种比喻都形象地说明了浙江在中共建党历史上的地位。参见徐连林《弘扬“红船精神”的历史及现实意义》,人民网·强国访谈·时政,2014年7月30日,http://ft.people.com.cn/fangtanDetail.do? pid=2716.

对于党的创建来说,本来应该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上海,却与完美的圆点擦肩而过,多多少少有点历史遗憾;而对于本来并不太相关的浙江来说,却为党的创建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其实,中共的诞生,无论对于上海还是浙江,都是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合力作用的结果。着意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偏颇的,都是偏离历史本来面目的。

作为后来的研究者,看待和评价这段历史,只能实事求是,慎重判断,不能拔高,也不必贬低。任何观点都要有丰富的史料支撑,要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要经得起后来者的质疑。

事实上,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红船起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但不仅仅属于浙江。红船精神的实践基础应包括中国早期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探索,以及党的一大之前上海、北京、巴黎、东京等国内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学界对红船精神的阐释理应超越浙江,超越地域性因素。

二、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而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当无疑义。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易生误解。习近平同志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说:“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文章另一处也总结道:“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6]。显然,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就红船见证党的创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言的,其意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

但是,一些学者在阐释红船精神时,往往忽视了习近平同志论述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历史场景,认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这容易形成一种固有观念,或给公众以误导,即中共建

党以前中国无革命实践,红船精神之前中国无革命精神。

当然,这涉及到对“革命”一词的理解问题。革命的涵义非常广泛。广义的革命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而狭义的革命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7]“革命”不仅涵义丰富,而且相对含混。有学者指出,自清末至1920年代,革命话语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1920年代,无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青年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三党都有一套惟己独革、惟己最革的革命话语。^[8]其实,革命何止流行并“泛滥”于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放眼观之,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调。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9]^[P96]我国历史学家张海鹏认为,“在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进步的主旋律”。^[10]

尽管革命涵义丰富甚至广泛含混,但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场景来看,革命的本意应是“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践。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11]^[P17],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二大决议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2]^[P3,P6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的涵义有所扩大和延伸,它包括了中国人民进行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大学课堂多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讲授内容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涵盖了1840年到1970年代末长达近140年的历史。

显然,从革命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以

前,至少还有中国国民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从革命实践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至少还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数不清的历朝历代农民革命。既然在中共诞生以前,还有革命主体、有革命实践,也就有相对应的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船精神只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而不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学界,既然是阐释红船精神的学术文章,学术的严谨性不能忽视,不可小觑。

三、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但非全部“源头活水”

如前所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这个“源”,是“源头”、“起源”,即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源处。不少学者在论述这层含义时,往往过于强调红船精神的意义,有意无意抬高红船精神的地位,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全部“源头活水”,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精神都是从红船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似乎是包含与被包含、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

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除红船精神外,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产生了其他一些著名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其中,井冈山精神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结晶。其内涵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第一次局部执政探索过程中所展现的精神风貌和所积累的思想结晶。其内涵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逆境中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南征北战寻求新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内涵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

力挽狂澜;浴血奋战、勇往直前。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局部执政探索、局部执政经验日益成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结晶。其内涵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折时期,进行伟大战略决策、制定新中国建国方略时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结晶。其内涵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

每一种精神都产生于特定的年代,对应着特定的历史场景,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实践的精神表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进而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13]

从时间上看,不同革命精神产生有先有后,红船精神是起点、是开篇,因而更加醒目一些,特殊一些。从内容上看,各种革命精神有交叉有重叠,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每一种精神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实践,都有着特定的内容,包含着特定的意义。从性质上看,不同革命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的本质为其他革命精神所继承,在此基础上,其他革命精神又有了新的发展。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产生的许许多多的精神,一起构筑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丰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3年,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设立“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把复旦大学、嘉兴大学、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学院、遵

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的八个研究中心纳入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其中,每一个大学的研究中心,其主要研究内容除包含当地党史外,大多包含和对应着一种相应的革命精神。如嘉兴大学对应红船精神,井冈山大学对应井冈山精神,赣南师范学院对应苏区精神,遵义师范学院对应长征精神,延安大学对应延安精神,河北师范大学对应西柏坡精神等。^[14]

由此可见,红船精神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其他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红船精神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

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涵盖与被涵盖、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其中,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是起点、是开篇,但并非全部“源头活水”;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是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综上所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红船所开辟的航道和航向规范了此后 20 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方向,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作为理论工作者,只有准确认识红船精神,科学阐释红船精神,才能彰显理论的深度和其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

参 考 文 献

- [1] 包晓峰.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的历史必然性[N].浙江日报,2011-04-29.
- [2] 郭维平.“红船精神”与浙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观察与思考,2014,(4).
-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 1 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4] 游海华.中共浙江地方组织早期创建中的若干特点[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2).
- [5] 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J].历史研究,2011,(3).
- [6]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05-06-21.
- [7] 百度百科“革命”词条,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GVlJc6nTcPX41FfzjQR1YF-MKw9_SVdDmC2FdqRq6oMCd2v-3-EFBZEz9Y_tFqhFl2xFo6AKtyMvIXphsy2Lk2AD_24_6hr_wa5MowYE8a.
- [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J].历史研究,2004,(5).
- [9] 费正清.观察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 [10] 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6).
- [1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A]毛泽东选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 1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3]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05-06-21.
- [14]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简介[N].光明日报,2013-08-01.

On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Red-boat Spirits

YOU Hai-hua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roposition of "Red-boat Spirits", a number of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and studi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misunderstandings. Some believes that the "Red Boat" started from Zhejiang Province and Red-boat Spirits was born in Zhejiang, which suggest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Zhengjiang-relatedness. Some even hold that Red-boat Spirits is the sour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Spirits and the only "origin" of the CPC's thoughts. The fact is not so. It is true that Red-boat Spirit is the CPC's spirit upon its birth formed in Zhejiang, but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beyond the confinement of locality. Red-boat Spirits is the origin of CPC's revolutionary spirits, but not its only "source", neither is it the origin of Chinese Revolution Spirits. Only 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 help illustrate its theoretical profundity and everlasting glory.

Key words: Red-boat Spirit; accurate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misunderstanding

(责任编辑:曾琼芳)